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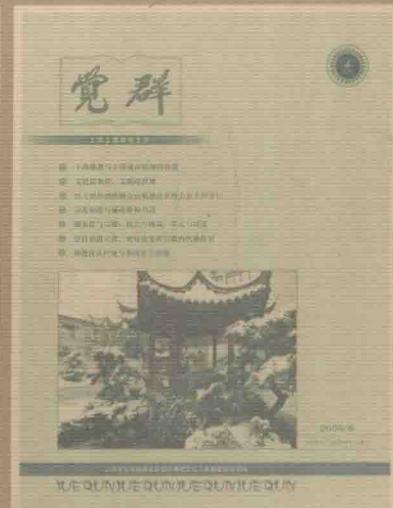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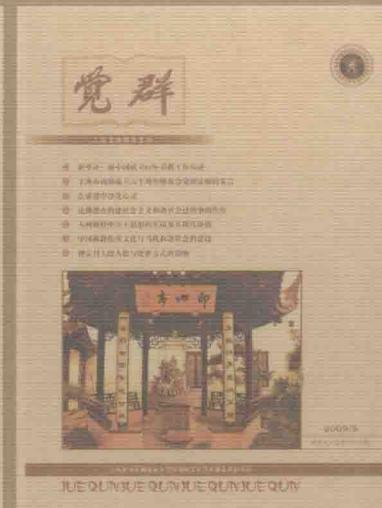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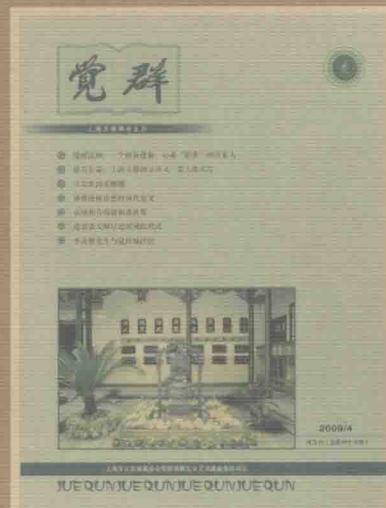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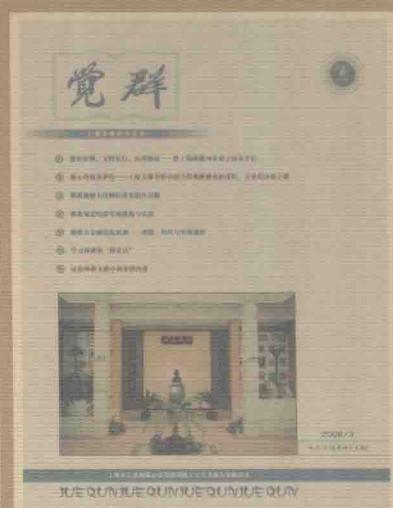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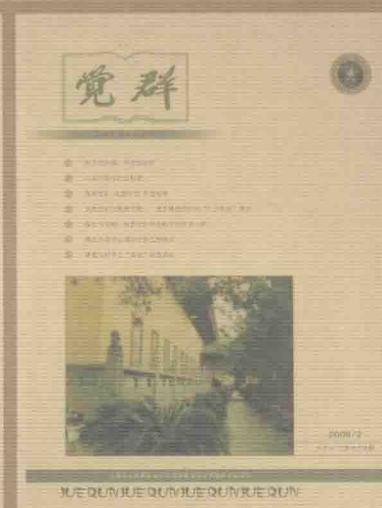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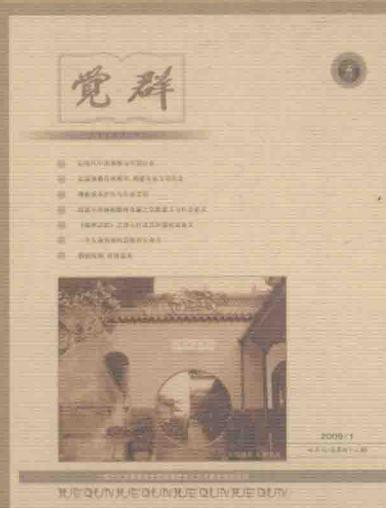
覺群



2009

合订本

上海玉佛禅寺主办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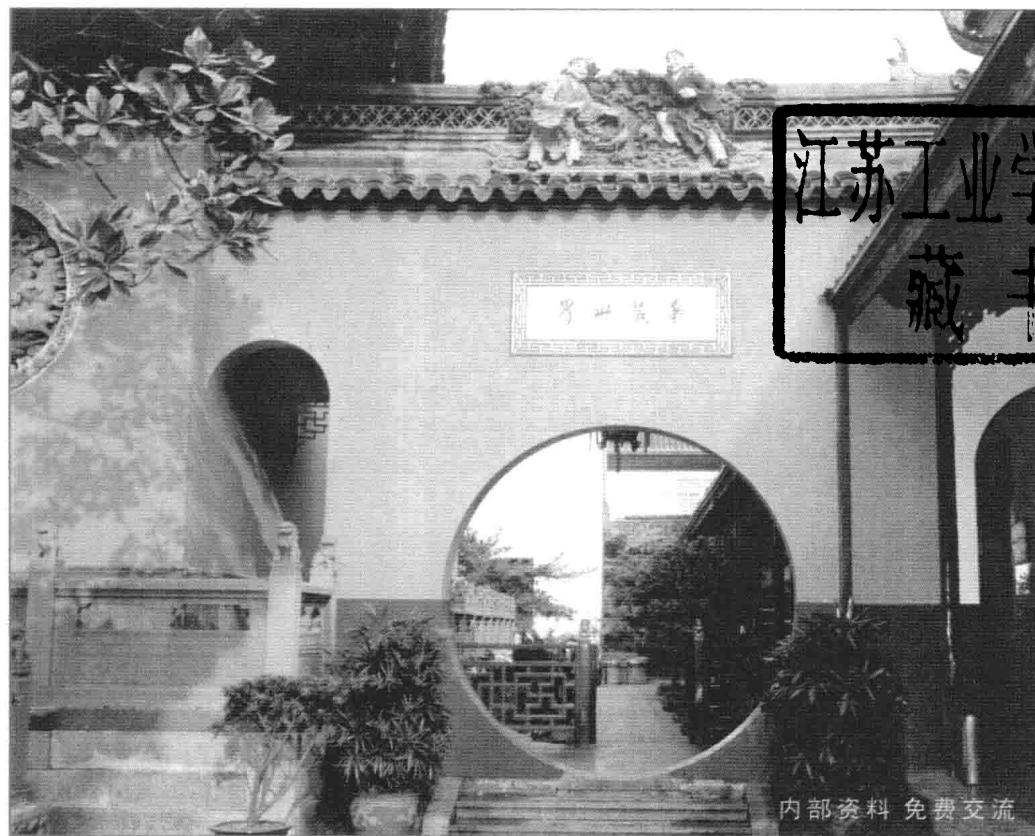
JUEQUNJUEQUNJUEQUNJUEQUN

覺群



上海玉佛禅寺主办

- ◎ 近现代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
- ◎ 弘扬佛教传统精华,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
- ◎ 佛教戒杀护生与生态文明
- ◎ 综说中国佛教断肉食蔬之宗教意义与社会意义
- ◎ 《维摩诘经》之净土行及其环境伦理意义
- ◎ 一个人最美丽的是他的生命力
- ◎ 婚姻指南, 学佛益友



2009/1

双月刊(总第四十三期)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JUEQUN JUEQUN JUEQUN JUEQUN

境随心转

觉醒/文 戴逸如/图



要用我们的心去转变环境，不要让环境来转变我们的心。不要逃避现实，必须面对现实，才能改造环境。



新年寄语

吉祥的钟声和着金牛的脚步悄然而至，中华大地激情洋溢，春意盎然！岁月更迭中，我们历数着旧岁的辉煌，我们期盼着新年的吉祥。祈愿佛光普照，祖国昌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送走悲欣交集的2008，承续成功奥运与神七问天的欢欣，铭记冰雪震灾中的众志成城，经受金融危机的风雨洗礼，弘扬喜迎世博的积极理念，新的一年，《觉群》有义务秉承灾难和成功中积淀下来的不朽精神，倍加珍惜各方支持，继续做好展示佛门的窗口、弘扬佛法的喉舌、联系大众的纽带。

展望2009，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年，是喜迎上海世博的关键一年，也是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举办之年，贯彻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和谐世界，众缘和合”的积极理念，配合《迎世博600天行动纲要》的实施，2009年的《觉群》，一定会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大力宣传佛教界在文化建设、对外交往、自身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慈善等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充分调动和发挥佛教文化在促进佛教事业健康发展、构建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让我们沐浴着和谐的春风，牢固树立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的时代意识，锐意开拓，踏实进取，不断开创新时期佛教文化建设事业的崭新局面！



上海玉佛禅寺主办

QUNJUEQUNJUEQUNJUEQUNJUEQUNJUEQUNJUEQUN

觉苑心莲

- 46 清白良心
48 缘来如此
50 云的禅法

阿莲
延德
王大伟

影尘回廊

- 52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现代高僧巨赞法师

继平



开卷有益

- 55 婚姻指南，学佛益友
——读《佛教婚姻观》

菩提燕

常青藤

- 58 修心三要素
60 让你的真心指引你
61 逆境与转机

开悟的木鱼
慈喜居士
石志菊

知与识

- 62 禅七与佛七

常静

觉群英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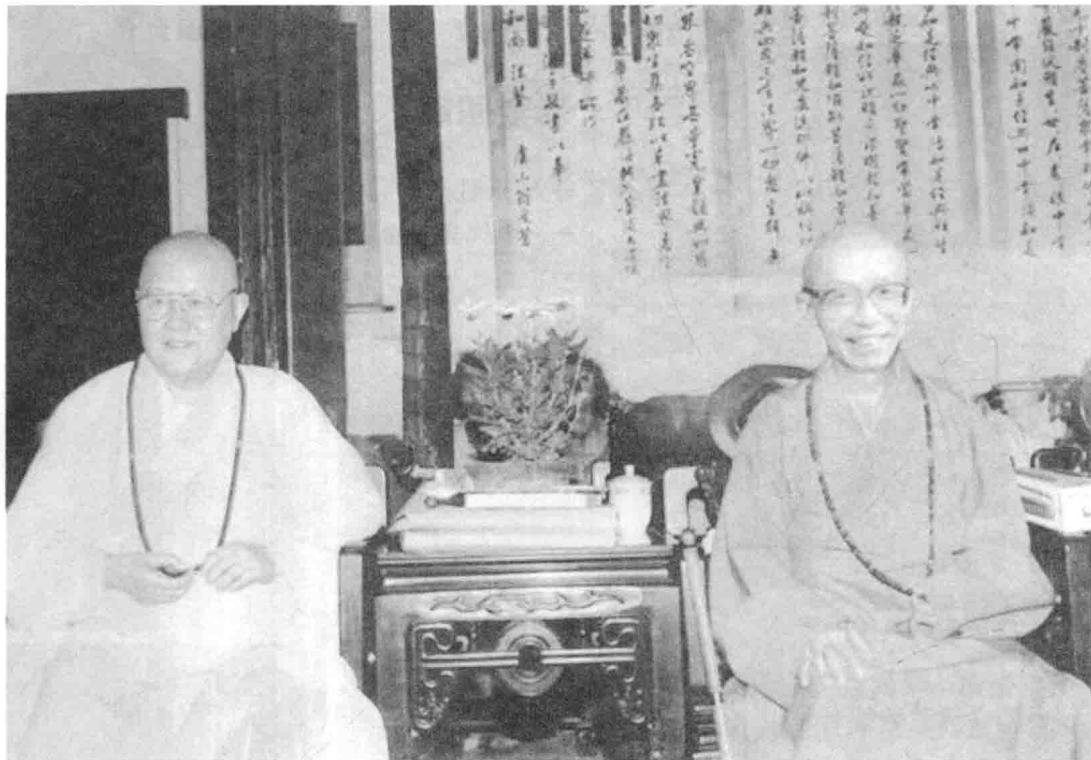
- 66 Practical Guide to True Way of Living



圣言懿行作楷模，严己诲人永留芳

——深切缅怀法鼓山宗祖圣严长老

□ 觉醒



圣严长老参访玉佛寺与真禅长老合影

山林含悲，江河呜咽，敬爱的圣严长老挥别尘缘，西归极乐。高僧消殒，四众扼腕。

圣严长老童年入道，勤学多闻，解行并重，教观双运，禅律同扬，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悲愿深切，广弘佛法，立足世间，引领社会，著述等身，事业广布，明德流芳，道俗同钦，堪称人世间的明灯、菩萨行的典范！明灯长照、典范不朽。圣严长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长老一生，圣言懿行，严己宽人，孜孜以求于

弘扬中华禅和法鼓宗，为法鼓山的振兴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自喻为“风雪中的行脚僧”的圣严长老，曾获选为“四百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五十位人士”。

长老自幼体弱多病，狼山出家后，历经经忏、军旅生涯，而后终能再度出家，不论闭关苦修、日本留学、美国弘法，或是开创法鼓山……，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在艰辛中见悲愿，在坚毅中见禅慧，生命对他而言，就是一场实践佛法的历程。

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众素质，圣严长老以40岁之龄，毅然决定留学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奔波于美台两地弘扬佛法，更以其禀承的临济及曹

洞两系法脉，至世界各地指导禅修，接引无数东西方人士。为了以现代人的语言和观点普传佛法，长老在极其忙碌的行程中，仍不忘著书写作，至今已出版超过一百本书。

长老自身学养渊博，除创立“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大学”，培养高等研究人才，近年来，还多次与科技、艺术、文化等领域之菁英人士展开对谈，乃至与不同教派、不同宗教进行合作，其宽阔的胸襟与国际化的视野，深获海内外各界的肯定。法鼓山就在圣严长老的带领下，立足台湾，以汉传佛教为根本，不断朝国际化、多元化的目标迈进。

长老一生，大力倡导“心灵环保”、“种族和谐”与“世界和平”，致力建设人间净土，起大悲心，恒顺众生，深受海内外佛教四众弟子爱戴和尊敬。

圣严长老认为，“要想国泰民安，一定要从挽救人心做起，挽救人心，则需从教育着手。所谓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课程，还应重视于佛教的信仰，那就是用因果的观念安慰人心又鼓舞人心，也就是所谓：‘欲知过去事，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事，现在做者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安分守己，尽其在我，努力不懈。既不逃避现实，也不推诿责任，面对一切的问题，用慈悲、用智慧，来纠正它，改善它。”从1992年起，圣严长老就提出了以“心灵环保”为核心的四种环保运动，而后又提出“心五四运动”来疗救现代社会人心的过于急功近利、浮躁、混乱以至沉沦，改造社会生活，保护自然环境，以及两方面的紧密结合。

四种环保运动，以心灵环保为主导，落实生活、礼仪、自然三大环保，由生活、礼仪、自然环保的实践过程，帮助我们的心愈来愈纯净，愈来愈光明，进而成就心灵环保。

1999年，圣严长老提出了号称“精神启蒙运动”的“心五四运动”，作为四种环保的具体落实和深化，从而将佛法人间化、人性化和生活化。提升人品有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业；自在人生有四要，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能要该要的才要、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解决困境有四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与人相处有四感，感恩使我们成长、感谢给我们机会、用佛法感化自己、用行为感动他人；增进福祉有四福，知福、惜福、培福、种福。“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



2006年觉醒大和尚参访台湾法鼓山

五项内容，是把佛法普遍地运用在生活中，所以是生活化的佛法；因为佛学足以提升人性为本，所以是人性化的佛学；因为佛教是属于人间的，所以是人间化的佛教。

长老一生，力弘“大悲心起”理念，关心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身心安康，对大陆同胞遭遇“5.12”特大地震更是心急如焚，感同身受。

汶川地震发生后，圣严长老于第一时间组织法鼓山僧俗大众为灾区募捐、捐物、派遣医疗队，并亲自给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打电话了解灾情。长老饱含深情地指出，我们中国人讲“多难兴邦”、“居安思危”、“临危不乱”。我们一次次遇到灾难，但我们一次次地成长。不畏惧灾难，让灾难变成我们成长的营养。时隔半个月，圣严长老庄严宣布，法鼓山要为四川灾区的重建做六件实事：为绵阳市安县秀水镇重建二所小学；为秀水镇建一所中学；在秀水镇建一所医院；为秀水镇重建自来水厂；重建新村，为村民盖房子；设立奖学金帮助受灾的青少年完成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圣严长老进一步提出，救灾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救命，协助灾区民众脱离险境；第二阶段是安身，安置灾民，安家及安业，让他们生活有所寄托；第三阶段是安心，即关怀灾民的心理、心灵。法鼓山除参加四川震灾的救助抢险外，还要参加灾区重建的硬件建设和心理慰问的软件工作。安心工程是法鼓山的专业优势。安心工程是从悲伤的心理层面做关怀慰问，让灾民走出伤痛，对日后生活有所希望而不再茫然不安，还要从灾难中发现人性的光辉与良善，进而去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亲人般的关爱、菩萨样的心肠，圣严长老与台湾佛教界的同仁们一起，为“中华儿女是一家”写下了闪光的注脚。

二

圣严长老与上海佛教有着深厚的法缘，早在1947年，圣严长老就读于上海静安寺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英文和数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国文是高中程度，佛学则是教《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长老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直到1949年入伍从戎为止。落实宗教政策后，随着两岸佛教往来的进一步加深，圣严长老多次来到上海访问，与玉佛寺已故方丈真禅大和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双方多次互访，为两岸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树立了典范。用圣严长老的话说：“两岸早就统一了，统一在中国佛教”。正是本着这一精神，长老始终关注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为中国佛教的振兴呕心沥血、勤恳耕耘，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记得当时我还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圣严长老到访玉佛寺，此时正值腊月，玉佛寺正在举行禅七，圣严长老的来访，受到了真禅大和尚的热烈欢迎，长老应邀来到禅堂，为僧众们讲开示，长老的开示为时一刻钟左右，内容正是长老所竭力倡导的“中华禅”。长老指出：禅是清净的智慧；禅是无染的心灵；禅是“无相”、“无住”、“无念”的精神境界。禅修就是要破除由自我意识引起的人我和法我相，而成就无我的悟境。放下自私心、自我中心，大悲心自然会应运而起。长老强调：禅需要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的禅



◀ 2008年台湾法鼓山果东大和尚率团参访玉佛寺

修要做到：身心合一、心口一致、心眼一如。后来才知道，圣严长老在玉佛寺禅堂开示的内容正是他后期竭力弘扬的“中华禅法鼓宗”的精髓所在。

作为晚辈，我早年在跟随真禅大和尚出访台湾以及在大陆参与接待过程中，有缘与圣严长老相识，长老宽厚仁爱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世纪本人也曾多次率团参访台湾，多次到法鼓山礼佛，由于圣严长老法体违和或不在山中，因而接待我们的大都是果东法师。

果东法师，1993年于圣严长老座下出家，曾任长老的侍者、助念团及护法总会辅导法师、关怀院监院、僧团男众部副都监，也是圣严长老于2005年传法的法子之一。2006年9月，接任法鼓山第二任方丈和尚，并于2007年接任法鼓山僧伽大学院长。

自出家以来，果东法师深获圣严长老倚重，担负起信众关怀的工作，尤其担任法鼓山助念团、护法总会辅导法师期间，秉持圣严长老所推动的心灵环保、礼仪环保、生活环保、自然环保等四大环保理念，有效推动清净、简约、庄严、隆重的佛化奠祭，改善社会的传统殡葬观念。在许多重大灾难发生时，果东法师经常是最先率领救援或助念团人员抵达现场，代表法鼓山担负起临终关怀、急难救助等工作。

法师除了关怀的脚步不曾间歇，还经常往来于内地及世界各地弘扬佛法，不论是大型座谈、校园演讲、社区关怀等，处处可闻法师妙语如珠，藉由深入浅出、幽默生动的言辞，致力于以“心五四运动”、“心六伦”等圣严长老所提出的具体做法，推动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等三大教育，朝向提升人品、建设净土的目标前进。

果东法师在就任方丈和尚典礼时宣誓：“将以实践圣严法师创办法鼓山的理念、精神、方针和方法为依归；奉献自己，成就大众；并以延续弘扬汉传佛教永住于世为任务。”而这正是果东法师带领法鼓山僧团、培育僧才迈向未来的目标与志向。

果东法师接任法鼓山方丈以来，继续圣严长老的一贯行持，对于推动两岸佛教友好交流事业不遗余力。前不久还亲自率团到大陆各地参访，并把玉佛寺作为其访问上海的重要一站，

我们与国家宗教局及上海市有关政府部门一起，热情接待了果东法师一行，法师渊博的学识及宽厚仁慈的言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僧示寂，四众扼腕。法鼓重响，宗风再振。相信法鼓山在果东法师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积极继承圣严长老的遗志，以他老人家为楷模，为法鼓山的振兴、为中华佛教的繁荣、为两岸佛教的交流和发展，精进努力，不懈进取，再展蓝图！

斯人逝矣，东风难唤，缅昔追远，继往开来。作为圣严长老等前辈高僧大德未竟事业的传承者，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老一辈高僧大德的遗志，沿着先辈们的光辉足迹奋勇向前，为光大中国佛教、为建立人间净土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呜呼！大德凋零，高僧日寥，色身无常，愿力恒在。至诚祈愿圣严长老如其意愿所指：早登莲邦，乘愿再来！

玉佛寺举行“温暖除夕夜”慈善晚会 并设立“觉群慈善创业基金”

2009年元月25日（农历除夕夜）晚9:30，“温暖除夕夜”慈善晚会在玉佛寺隆重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中华全国慈善总会名誉会长、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铁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委主任周富长等有关方面领导，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方丈觉醒大和尚等主办单位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约800人出席了晚会。

作为玉佛寺联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等单位共同推出的奉献给上海人民的年度大餐，“温暖除夕夜”慈善晚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重视。作为晚会的具体承办方，玉佛寺希望能够通过艺术这一逾越一切界线的形式，唤起全社会共同关注与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爱心。

今年的晚会，除沿袭往年的惯例，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25万元，用于资助上海100名贫困学生早日完成学业，以及举行名家书画及佛教艺术品慈善义拍，为社会贫困人士募集善款外，玉佛寺还将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隆重推出“觉群慈善创业基金”项目，该项基金由玉佛寺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青联、共青团上海市委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首期1000万元，专项用于资助上海大学生自主创业、再就业，以此缓解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更大程度地鼓舞大学生们的士气，积极推动全社会共同关注大学生的就业与创业，为早日度过金融危机而锐意进取，多作贡献。

觉醒大和尚在致辞中表示：感恩党的政策光辉，真诚回报社会关爱，由玉佛寺联合数家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的“温暖除夕夜”慈善晚会，旨在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以佛门弟子的一份真诚和热情，为党和政府

分忧，为上海人民祈福。

晚会结束后，觉醒大和尚致新年贺辞，并敲响己丑新年第一钟，随后，各界人士代表依次敲响108下钟声。吉祥的钟声回荡在玉佛寺上空，传递着上海佛教四众弟子对世界和平、国家昌隆、人民幸福的殷殷期盼和祝福。

为了表达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激之情，回报社会各界对玉佛寺的关心和护持，践行佛教“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思想，近年来，玉佛寺积极致力于社会慈善帮困事业。从2000年开始，玉佛寺于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三，定期地为100名困难学生和100户困难家庭举行助学帮困活动，捐赠数额从开始的2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35万元。为使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自2005年起，玉佛寺每年从除夕晚上的香花券功德金以及信徒的供奉捐献中提取款项，注入“觉群慈善基金”，九年来，累计出资285万元，使1800余人次困难学生和家庭直接受益。

秉承为社会分忧、为困难群体造福的理念，多年来玉佛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2000年捐资200万设立了“真禅专项帮困基金”；2004年觉群大楼落成之际，捐赠10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困难学生助学；2005年1月捐赠50万元成立了“觉群慈善专项基金”，帮助为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且生活上遇到困难的老同志；2007、2008年初一出售的香花券所得，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专项用于“觉群慈善教育培训基地”，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2008年冰雪灾害及汶川地震中，玉佛寺累计向市红十字会、市慈善基金会捐赠善款500余万元及衣物棉被若干件。自1994年以来，无论是面对洪涝、地震、海啸、冰雪和“非典”等自然灾害，还是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困难群体，玉佛寺都会尽己所能，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玉佛寺通过各种方式为社会捐款捐物，累计金额已超过3000万元。



近现代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

□ 钱文忠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被设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则被认定为1911年。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分期，主要是以政治事件为关注点的，换句话说，上述的主要是一种政治史的分期。

文化、宗教和政治当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前者就只不过是后者的应声虫或者影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宗教有着自己的命运、脉搏、气韵，也就是说，有着属于自己的活生生的生命。

既然如此，我们在今天所讲的“近现代”就和上面所讲的政治史分期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从佛教史的角度看，佛教的近代史开端应该和太平天国的爆发大致接近。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佛教自身的发展历程也不象政治史那样，可以找到某些比较明确的分水岭，或者是决定性的事件。它更象是一条潺潺不息的大河，在某些时候会有浪涛，会有漩涡，但是从来也不会变成清晰可分的两截水流。此外，我们今天

的题目是“近现代”，然而，不可避免的，我们会谈到佛教和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按照一般的政治史分期，“当代中国”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的。

我们应该首先用历史和国际的眼光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略加考察。

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之一，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的排他性较小，可容性和可塑性之大，甚至使有些人怀疑佛教究竟还算不算宗教。我们知道，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印度教和汹涌而入的伊斯兰教的双重冲击，早在800年前就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印度之外诸国或地区的佛教尽管很早就失去了原初根源，却在各自本国文化的土壤上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展现出带有本土文化色彩的勃勃生机。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历史的机缘，但佛教不预设超越众生的造物主、不舍世间的理念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说明佛教的圆融无碍。比如，雪山之国尼泊尔的佛教

被公认为是保留印度色彩最浓的，可是，我们在尼瓦利语（Newari）里居然已经找不到表示“僧人”的字了，取而代之的，是密宗化的或者说本土化的“金刚法师”（vajracarya）。

同样发人深省的还有，约东汉年间传到中国的佛教，到了中唐以后，中国化程度最高、“教外别传”的禅宗却一枝独秀。曾几何时，被视作“夷狄之教”的佛教以追怀始祖的生命体验，扬弃了印度佛教的固有形式，以内省、自主、自信的宗教践履的体证方式，深深融入了中国的哲学、艺术、文学。

中国佛教中经隋唐数百年的兴盛，到五代始法运衰息，此后天台、华严等宗大倡法风，又多合行兼弘禅净。宋明大儒擅长出入儒佛二门，相互汲引。到了晚明清初，更以禅净双修为归，包容一切法门。佛门内，不再严辨宗派界限；佛门外，则与儒学同气相求。伴随着这个过程，佛教的入世取向也日渐明显。一方面浸入民间，参与世俗生活，给人无穷希望的弥勒和观音成为领受香烟与顶礼的要角；一方面，以“忠义心”诠释“菩萨心”，护国行法，声援民族之战。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萌芽就在这种无声的变迁过程中滋长起来了。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开去，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佛教在近现代的复兴绝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在东亚、东南亚、南亚都普遍掀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1873年，在斯里兰卡的科隆坡附近，举行了一次耗时三天的公开辩论，一位僧伽罗高僧最终战胜了卫理公会牧师。这场辩论带有浓厚的东西文化对垒争胜的气息，其结果被广泛报道，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1873年也就因此被视为近现代世界性佛教复兴的标志年份。“世界性”并非言过其实：不久以后，新大陆和欧洲也都出现了僧伽，佛学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同样也是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佛教（准确地说，应是汉地佛教）也渐渐复苏，在践履上归心净土，在佛理上精研法相唯识，士大夫之间的佛学热成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主要特征。虽然我们至今尚未找到证据，表明中国佛教复兴与科隆坡的那场著名辩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但是，无可否认，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尽管具有自己的独特内容、形式与轨迹，却至少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佛教复兴运动几乎都是在已经沦为殖民地、或即将沦为殖民地、备受西方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

这也许是各国佛教复兴运动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中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佛教复兴运动必然是带有抗拒西方文化影响色彩的社会运动，佛教教理自身的发展倒是只能位居其次了。

中国近代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古国在西方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社会历经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生。欲求安身立命之所，遁逃入佛者有之；栖心内典，真学佛而欲求民族解脱大道，赴以积极精神者有之；先期厌离世间，一心出世，转念救拔众生，出世又不舍世间者有之。相对于在经世思想、公羊学鼓噪下的社会改造运动，佛教复兴起先只是一条“伏流”。然而，正是这条伏流，在上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歌动了无数的新学人士。在“振兴佛教”的和声下，僧人、居士与新学人士都希冀再度发挥佛教整合社会思想文化的价值功能。

我们看到，希图佛教复兴的首要步骤，就是把当时已经衰微的佛教重新拔擢到一个超越西学的至高位置，这是僧、俗两众的共识。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可谓代表，于是居高临下评说世间万法似乎就有了可能和理据。还有不少人反复论证，佛法正是济世灵丹，王恩洋《佛法为今时所必须》、梁启超《佛学时代》都在呼唤新佛教徒的出现。其次，为了致对外，力争与儒学结盟，暂时不顾超越层面的矛盾，用合并等同的方法为原本是外来的佛教争得中国文化的主流位置，弘扬净土、推行念佛法门的印光法师就著有《儒释一贯彻序》；再次，不断对道德、人生、卫生乃至人死之际应做之事加以指导，不惜在科学至上的年代担冒被讥笑为迷信的巨大风险，如圆瑛《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周叔迦《从佛教徒的人格说起》等。为了使佛教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育



人才，改革僧教育，中国佛教复兴的先驱杨文会创办学堂，以出世法与世间法并无二致的理念，分教内教外两班，宣扬佛法，若僧侣太虚、智光，若居士欧阳竟无、梅光羲，若学者谭嗣同等，都领受其教，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中坚力量。太虚更以创办“中华佛教总会”的组织方式，倡导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曾追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太虚法师主张佛教必须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形态。这“新形态”就是“学佛先从做人起”，就是关注宇宙人生的“人生佛教”。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是一个极具意味的社会现象，它对现代性问题的独特应对，它援引西方文献学方法整理梵、藏、汉文佛经的学术研究，它以佛教为源泉的哲学原创造性活动等等，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宗教，就中国而言，除了公认的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外，还在一定时间、地域和人群内流行过其他一些宗教，比如景教、摩尼教、拜火教，以及由它们和中国民间准宗教因素相互结合而成的诸如明教、白莲教，等等。但是，这些宗教都逐渐消亡了，没有能够象五大宗教，特别是佛教那样产生过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广、奉持人数如此之多的影响与作用。

佛教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法难，而之所以能安度劫波，持久驻世，繁荣昌盛，这当然是由很多原因促成的。从宗教社会学和功能学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创始人佛陀本身、佛法理论以及包括在家信众在内的广义僧伽，即佛法僧三宝从本原上所拥有的，更由三者圆融无碍的互为依持、互为生发的社会功能，比较之下具备了程度极高的普世性、适时性、兼容性、易持性，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佛教的社会功能以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发挥与实现，是一个蕴义深远的重大课题，对之必须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而这显然不可能是本文所要完成的任务。本文不是一篇佛教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只打算就以上几个方面，亦即“超社群的凝聚功能”、“超专业的教育功能”、“超事相的抚慰功能”和“超界别的摄护功能”，谈一谈作者对佛教社会功能问题的一些粗浅的思考。需要说明的是，首先，这些方面远远不足以概括佛教所具备的全部社会功能，也并不是说这些是最重要的功能；其次，这些功能在佛教的发展历史上一直得到体现，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回顾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呈现和演进，而是对这些功能在现代社会

里的必要性略加说明；再次，这四个方面是不能彼此截然分割的，实际上是彼此包蕴相互依托的，分列出这四个方面，只是为了使论述的不同角度能够比较明确而已。

一、超社区的凝聚功能

在现代社会，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则是“圈子”的意识和现实也在不断加强。特别是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里，社区日益成为处于繁忙世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重要的生活和交往“圈子”。如果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家庭生活可以被比喻为小“圈子”的话，那么社区已经成了与世人的工作圈子大致平行的生活“中圈子”了。

“圈子”明显带有前现代社会的阶层等级的遗传基因，在现代社会里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还有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复杂化、进一步封闭化的趋势，这一点似乎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在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里，收入相当、地位类似、文化层次接近的人越来越聚集生活在价值同等的、一般挂有“私家住宅”的社区里。都市在开放，社区在封闭，人群在分层。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有欠健康的现实。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仍在日趋严重。

解决这个问题有多种方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无疑，佛教可以为缓解这种封闭的社会生活状况贡献自己的力量。佛教倡导“众生平等”。无论从事的行业、所处的地位、获得的收入有多大的不同，佛门之内一律平等。在佛光的普照下，一切不平等、一切分殊差别，都应该能够平等相待，和平共处，融洽交流。

都市里的佛教更是倾向于以寺庙为中心，可以举办各种法事活动，汇聚不同背景的善男信女，发扬平等精神，将寺庙转化为一个体现佛法的无边的“圈子”。这个“圈子”没有围墙，没有保安，更没有精神的疏离和隔绝。无论多么高傲的人，一进入这个“圈子”，都会感到自己的凡性，都要低下头来，再不会俯视他人；无论多么卑贱的人，一进入这个“圈子”，都会感到自己的佛性，都会抬起头来，再不必仰视他人。

这是一种超越任何社区的平等无碍的圈子。

二、超专业的教育功能

无可否认，社会的现代化是和社会分工的明确和强化相依相随的。现实决定了人们必须接受专业色彩日渐浓烈的现代教育。这种教育使人们往纵深掘进了

知识，处理特定问题的能力大大加强了。大量的专家型人材支撑了现代化的时代。

现代教育是以“科学”为精神支柱的，而“科学精神”在极大程度上是反对主观，信奉“价值中立”的。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是，社会现实却令人质疑，难道这就足够了吗？接受了专业教育的人就注定是现代人了吗？

答案是不必犹豫的“不”。触目可见的社会现实是，物质生活的丰富，技术手段的完善，并没有使人们的道德水平得到同步提高。现代化的教育将人培养成精通机器电脑的专家，却并没有使这些专家了解自我的水平得到同步提高。前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古老陋习的幽灵仍然在现代社会里昂首阔步，现代社会还孵育出很多新的罪恶。

个人主义盛行，团队意识淡漠；留意私德，贬抑哲学原创性活动；强调个人自由，藐视清规戒律；对获取斤斤计较，对给予不屑一顾；颂扬竞争，贬斥退让；仰望强者如云霓，俯视弱者若草芥……

这一切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和结果吗？对此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

佛法就是消弭一切执见催人觉悟的教材，寺庙就是可以提供超越专业之上的各种课程的学校，高僧大德就是以身说法的教师。佛教应该努力为正在学校中的和已经走出学校的世人准备另一个终身就读的大学校，编撰一套让世人终身受益的大教材。

这是一种超越任何专业的宏通圆融的教育。

三、超事相的抚慰功能

幸福只有一种幸福，不幸却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任何时代都有失意、痛苦、悲伤乃至绝望的人。现代社会遗传了以前所有的一切不如意，还滋生了无穷无尽的新苦难。

现代社会是进步了，身体有病可以去医院，受到冤屈可以去法院，遭到偷盗可以找警察……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来到寺庙，真诚地进香祝祷，虔敬地叩拜礼佛？

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太复杂了，明确的无奈依旧不少，莫名的烦恼与日俱增。现代人有太多的苦恼，不知道向哪个部门倾诉；现代人有太多的痛苦，不知道向哪个医院求医。于是，现代人来到了古老的寺庙。

现代人为什么离开现代的电脑、电话、电视，来到祖先常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才能得到抚慰。这里接待过不知电灯为何物的古人，今天仍然接待着他们已经迈入网络时代的后人。这里的抚慰功能是永恒有效

的，因为这种功能不受具体时代、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拘约。

佛教以一应万，汇万成一，它着力发掘不同事相背后的事理，无往不破，从而给世人提供一个解脱一切苦恼的大法门。

这是一种超越任何事相的慈悲博大的抚慰。

四、超界别的摄护功能

佛教的摄护功能是一直受到世人感念的。观世音的救苦救难，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摄护功能，在现代社会里不仅依然具有，而且会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功用。

现代世界充满诱惑。现代人生活多姿多彩，营养全面富足，娱乐纷繁刺激。佛教能够告诉现代人的当然绝不止于素食有益于身体健康，更重要的还能够提醒他们注意精神的康泰，懂得清心寡欲的可贵，澄心静虑的可喜。让现代人稍稍将自己从繁杂的事务中抽身而退，回观自我内心。佛教还可以教会世人对心理健康大有裨益的倾诉与倾听的法门、慈悲怜悯的胸怀。

这是就人而言，在天人矛盾日见尖锐，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甚至已经有博学鸿儒发出了21世纪的最大道德乃是保护环境的“狮子吼”。这正是最需要佛教发挥其对自然的摄护功能的时候。

古语有云：“天下名山僧占半”，现在看来，这句话只不过说出了一半道理，因为它首先抹煞了佛教开山的功德。难道不是因为有了佛教的经营，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丛榛丛莽才有了“名山”的美称？回顾一部中国佛教史，对佛教的开山护山功德岂能熟视无睹？即使在都市里，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佛教寺庙也是最为清净幽雅的地方。佛教的慈悲与不杀，并不仅仅针对动物而言。佛教早就倡导对一草一木的生命的敬重，悲切甚至及于种子。这都是彰彰载于佛典的。

面对越演越烈的现代环境恶化，佛教正应该登高而呼，引领信众保护环境，善待自然，让世间所居都象佛寺一样山明水秀、清净幽雅。

这是一种超越任何界别的天人合一的摄护。

佛教的社会功能需要进一步的开放阐释，也需要加强与现代社会的关联，着重应对随时出现演变的现实问题。这也是弘扬佛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之，近现代中国佛教和社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课题。特别在举国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佛教一定能够提供巨大的有益的资源。这需要我们大家，包括僧俗大众的共同努力。这篇小小的演讲，其实是一次我向大家请教，所谈的也只能是自己的点滴思考。卍



弘扬佛教传统精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

—《佛教与生态文明》研讨会论文集序

□ 觉 醒

2008 是我国大事频发的一年，既有让人欣喜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七号”宇宙飞船顺利升空，并实现宇航员的首次太空行走，创造了我们宇宙航天事业的新里程；同时也有让国人和世人永志不忘的百年一遇的年初大雪灾、造成近 9 万民众殒命的“5·12”汶川大地震。这一系列的喜和悲，昭示着世人：在改造自然世界、追求现世舒适生活的同时，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担负起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责任，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此，生态文明建设引起了包括佛教界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要求，结合佛教的理论，我们认为深入研究“佛教与生态文明”，动员佛教界人士共同维护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积极的社

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反映的是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近二十年来，生态科学与环境科学飞速发展，为生态文明的兴起作了科学和理论的准备。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各地掀起的“绿色运动”、六十年代的生态农业、七十年代兴起的生态工程等，又为生态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实践基础，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生态文明观是对人类中心观，及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行为的深刻反思，是顺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潮流和规律的，是人类保护自身、呵

护自然、维护所有生灵的生存权，从而维护自身子孙后代生存权的一种意识觉醒。

生态文明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点，那就是它们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生态文明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人们树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价值和秩序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必须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在其自身发展、崛起的过程中，产生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共识。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上，是与生态文明的理念相一致的。生态文明力图用整体、协调的原则和机制，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生态观念和生态秩序，因而其运行的是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的生态轨迹。如果从维系人与自然的共生能力出发，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际和代际之间的公平性、共生性的原则出发，从文明的延续、转型和价值重铸的角度来认识，生态文明必将超越和替代工业文明。正是基于生态文明所具有的本质和特点，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佛教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意义，主要体现在佛法的教理体系、修学实践、戒律规范对于人们心态的调适作用，基于佛法对于人际、生灵、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对于我们倡导生态理念，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响应当前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健康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鉴于此，上海玉佛寺第七届觉群文化周选择以《佛教与生态文明》为主题，广泛邀请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法师居士，就佛教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能够作出的贡献，以及架构佛教生态

学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在两天的研讨过程中，与会人士围绕主题，各抒己见、深入探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讨会收到论文 50 余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闪光思想。为了让更多的教内外有识之士共享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课题的探索和争鸣，我们特意将这次研讨会的部分论文汇编成册。相信这些研究成果，一定会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新世纪佛教发展和弘化的基础，在于文化的建设和弘扬。以文化建设为桥梁，推动佛教的自身建设，是佛教与时代相适应的必由之路。二〇〇〇年以来，上海玉佛寺每年都在金秋时节，举办“觉群文化周”。贯彻“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寺院发展理念，多方位发掘和展示佛教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艺术形式，积极推动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觉悟群生，奉献社会”，是玉佛寺举办觉群文化周的主要目的。

在文化周期间举办学术研讨会，旨在活跃佛教学术气氛，促进佛教学术研究水准，提高寺院在学术层面弘法宣教的能力与水平。迄今为止，玉佛寺已经相继举办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佛教与当代社会”、“佛教与现代化”等专题研讨活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获得了来自教界、学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肯定。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建设的展开、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我国已经迎来了一个真正的机遇和挑战并举、问题和成就共存的非常的历史时刻，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各阶层不同的诉求，需要加以切实的厘清和解决。对于佛教而言，在如此催人奋进的年代，也需要以自身特有的话语体系，积极调动信仰理念和信仰资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始终引导广大信教社会成员，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以《佛教与生态文明》研讨活动为契机，我们呼吁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佛教戒杀护生



与生态文明

□ 温金玉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充满着生态环境方面的诸多问题。有资料表明自二战以来，核战争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这四大危机，已成为全球面临的最大难题。

据《中国环境危机报告》披露，全球每年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高达 300 亿吨，加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有害气体或尘埃，使得世界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的一半——大约 10 亿人，在呼吸着不健康的空气。人类正在承受着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着自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中国是世界上野生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多地失去接触和了解野生动物的机会。一份资料表明：中国的动植物物种种类已有 20% 受到严重威胁，高于世界 10% 的水平，在国际公认的 640 个濒

危野生动物中，中国占了 156 个。中国有近 1/3 的国土笼罩在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严重威胁中。地球物种的不断灭绝，正在使地球的生物的多样性和全球生态系统受到最为严重的损害，如果照此速度蔓延下去，那么在一二代人的时间内，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淡水、海鱼的可靠供应和肥沃的土壤将不复存在。而森林的消失以及土地的荒漠化、水土的不断流失等人为以及自然的灾害，不但给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空前损失，而且还直接威胁着地球生命的延续。另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一份《让选择继续下去》的研究报告表明：今天地球上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已经是自然状态下的 1000 倍，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在今后的 20 年内，每 10 年将丧失全球物种的 10%，也就是说，地球上每天将有近 150 个物种永远地消失……（焦辉东：《中国环境危机报告》）